

# 积极的阐释与消极的阐释

南 帆

(福建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 文本解读是人文学科的基本方法,文学阐释的很大一部分是对文学文本的阐释。“积极的阐释”与“消极的阐释”是文学阐释的两种理论姿态。“积极的阐释”频繁出场不仅是由于现代阐释学的转向,而且与理论的推动存在密切关系。文学之所以成为“积极的阐释”最为活跃的一个区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阐释的理性语言与感性体验不对称。“积极的阐释”放弃文本的有机整体观念,并时常跨越审美愉悦的羁绊而另行制造各种新的话题。“历史语境”既是阐释发生变化的依据,也是阐释稳定持续的依据。多数“积极的阐释”作为失败的思想实验而沉没,而少数“积极的阐释”则可能充当某种文化革命的先声。

关键词: 积极的阐释; 消极的阐释; 理解的前结构; 相对主义; 历史语境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94X(2024)05-0005-09

## 一

宽泛的意义上,阐释穿插在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空间。人们可能阐释一部经典作品,阐释一句名言;也可能阐释一项法律规定,阐释一个传统规范的由来。建筑师评价一幢宫殿的构造可以包含阐释,工程师说明计算机的软件设计也可以称为另一种阐释。所以,利科认为“不存在一般的解释学,也不存在解释的普遍准则,只有一些根本不同和相互对立的有关解释原则的理论。”<sup>[1]17</sup>尽管如此,利科还是明智地收缩了阐释的范围,指出阐释通常围绕文本展开:“解释学是关于与本文(text,现多译作‘文本’)相关连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本文的话语的实现问题”<sup>[1]41</sup>。

何谓文本? “‘本文’就是任何由书写所固

定下来的任何话语。”<sup>[1]148</sup>这是利科在《解释学与人文科学》之中表述的定义。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文本与口语交流之间的差异:“只有在本文不被限制在抄录先前的谈话、而是直接以书写字母的形式铭记话语的意义时,本文才真正是本文。”<sup>[1]149</sup>对于阐释学来说,这个差异恰恰是划分工作区域的依据。口语交流往往拥有一个现场,说话的主体与听众共同置身于时空构造的语境中,伴随交流产生的各种模糊、不解或者误解,可以由面对面的问答释除。然而,文本脱离了现场语境。因此,“作者不回答读者,而书把写的行为和读的行为分成了两边,它们之间没有交流。”<sup>[1]150</sup>这时,文本之中存在的各种悬疑不得不诉诸阐释。缺乏面对面及时的相互修正,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观念差距可能成为显眼的裂缝,甚至分道扬镳;同时,一个文本与另一些相关文本的各种联系陆续进

作者简介: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入视野,形成意义表述的彼此震荡。这种状况带来文本解读的各种落差既可能酿成误判,也可能隐含意外的思想收获。因此,相对于口语交流的简明意图与效果,阐释学的工作区域围绕文本的圆心。何谓误判,何谓意外的思想收获,这些问题本身即是现代阐释学聚讼的焦点。

如果说,大量的实验室工作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那么,文本解读仍然是人文学科的基本积累,包括众多古代典籍的阐释。因此,阐释学几乎与人文学科齐头并进。从宗教、史学、哲学到各种法典,阐释学按照各学科脉络持续展开,形成不同的分支。每一个分支不仅拥有基本典籍以及核心概念作为阐释对象以及阐释依据,而且显现出相对独特的阐释方法。经典的一个常见特征是,内涵的密度超过通常的文本。这是经典需要阐释的重要理由。

进入文学范畴,阐释的文本多半是文学作品。追溯文学研究的历史,围绕文学的各种论述始终包含阐释的意图。孔子断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的概括阐释了《诗经》的美学性质及其社会功能。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分析对象是悲剧与史诗,分析包含了大量阐释的成分。但是,众多批评家的论述表明,文学研究的各种阐释展现出相异的对象分解路径、理论观念与模式、关注焦点以及论证意图。譬如,通常意义上称谓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显示出微妙的区别。前者带有更多“学术”的意味,诸如作者身世与作品版本的考据,或者文学史资料的辨析;后者往往包含文学作品成败的评价,这种评价广泛联系某一个时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潮流。这时,“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阐释展现于不同的层面。

相对地说,古代文学的阐释聚焦作品本身的构成或者作品“内部”的种种元素。漫长的历史演变制造出种种隔阂,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必须从拆除语言或者历史背景隔阂开始,注明种种现今业已消亡的文化习俗、地域传统、人情世故等等。因此,训诂以及种种注解构成

了古代文学阐释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通常,当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并未遭受这些隔阂的困扰,批评家更多意识到文学与周边社会各种形式的互动,阐释双方激荡形成的深刻话题。当然,某些文学观念可能指定了文学阐释的范围。例如,“新批评”学派仅仅对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表示兴趣,并且聚焦作品的形式层面。批评家认为作品的实质取决于形式,形式才有资格成为阐释的对象。社会历史批评学派对于这种文学观念表示强烈的异议。批评家认为,文学的各种特征带有明显的历史烙印,包括文学形式。“外部研究”并非多余的外围盘旋,描述这些历史烙印恰恰阐释了文学的来龙去脉。对于阐释学来说,各种文学观念同时证明,哪些文学层面具有阐释的价值。

文学阐释的另一个重要分野是——作品或者作家。多数文学阐释指向作品本身,但是,作为一种正常的关联,另一些阐释转向了作品的创造者作家。从素材收集、人物的酝酿、灵感的闪现到作家生平、社交圈子、心理倾向乃至绯闻或者作息时间,围绕作家形成的阐释具有丰富的内容。什么样的天才完成了如此精彩的杰作?这个主题居高临下地统领各种作家的阐释。当然,正如人们所批评的那样,围绕作家的相当一部分琐碎考证几乎与这个主题丧失了联系,以至于这些阐释的意义遭到了广泛的质疑。

如果说古代/当代、“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作家/作品分别是不同文学阐释倾向的辨识标记,那么,我试图提出“积极的阐释”与“消极的阐释”来描述阐释的两种理论姿态。这两种理论姿态既可能存在于古代,也可能存在于当代;既可能是“内部研究”,也可能是“外部研究”;既可能发生在作家生平的考辨之间,也可能来自作品层面的周详分析。当然,这两种理论姿态并非执行事先规范的概念,而是在大量的阐释实践之中显现出愈来愈清晰的分野。

“积极的阐释”——阐释者时常依据某种理论或者理念鞭辟入里地阐释作品,发表自己的独到之见。他们的观点与常规的解读存在

相当大的距离,甚至惊世骇俗。这些阐释往往带来巨大的启迪,打开一个崭新的理论空间,同时伴随激烈的争议。阐释者倾向于迁就某种理论逻辑,不惜深文周纳,割裂作品的有机结构。作为一个相对的参照,“消极的阐释”通常尊重作家的写作意图,尊重作品的完整性与基本内涵,尊重各种文化常识与文体规则,阐释者的论述规范、严谨、缜密、中肯,渊博而且稳健、坚实,平凡、清明、持重同时又富于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消极的阐释”始终是“积极的阐释”频繁回望的起锚点。没有“消极”,何谓“积极”?恰恰由于“消极的阐释”的存在与制约,“积极的阐释”才不会成为失控的孤舟而随波逐流。当然,“积极的阐释”与“消极的阐释”仅仅是一种相对的区别而不是本质主义的规定,二者的界限可能游移变动。阐释的历史证明,某一个时期“积极的阐释”可能逐渐成为共识,演变为另一个时期的“消极的阐释”;另一些“积极的阐释”可能遭受证伪,从而销声匿迹。

“积极的”与“消极的”定语或许令人联想到以赛亚·伯林“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著名划分。但是,阐释的“积极”或者“消极”并未伴随褒贬的判断,同时,“消极的阐释”亦非必须坚守的界限。“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二者的辩证始终推动阐释学的波浪式运动。的确,“积极的”阐释者时常由狐狸型思想家扮演,例如弗洛伊德、德里达或者齐泽克。“消极的”阐释者显现出刺猬型思想家的特征。所谓“狐狸型”或者“刺猬型”的划分也是由于伯林的阐述而广为人知。

## 二

“积极的阐释”之所以愈来愈频繁地露面,理论的推波助澜是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被称为“理论时代”,诸多著名的理论学派接踵而至,从各个方向改造乃至撼动人文学科的悠久传统。对于文学阐释来说,精神分析学派或者“语言转向”名义下的分析哲学、结构主义无不

展示出一套前所未有的阐释模式,许多“积极的阐释”毋宁是这些阐释模式的产物。然而,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积极的阐释”来自阐释学转向的鼓励。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现代阐释学围绕若干问题反复争辩,新的共识逐渐形成,各种由来已久的观念桎梏开始失效。

首先,阐释学放弃了作者意图的还原。公允地说,作者意图对于文本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阐释无法将其完整恢复。正如《文心雕龙》所言“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sup>[2]</sup>语言并非得心应手的工具。某些时候,完成的文本仅仅部分实现作家的意图。换言之,阐释者无法依据文本准确逆推作者的意图。对于古人遗留的文本,阐释者的各种推测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另一方面,当代作家的自述亦非可靠的证词。无论是时过境迁产生的记忆讹误还是有意提供谎言,所谓的“作者意图”真伪莫辨。对于阐释者来说,与其考察作家想写什么,不如考察作家写出了什么。文本实际产生的意义远比作家的原初意图重要,阐释为什么不将目光集中于文本本身?解读文本的自身意义,阐释者甚至必须避免作者意图的干扰。“新批评”学派指出“意图谬误”的目的之一即是,规劝读者摆脱作家的炫目光环而专注于文本的“细读”。另一些思想家站在不同的理论立场表述了对于作者的排斥——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力图将作者形容为语言体系背后的傀儡<sup>[3]</sup>;福柯心目中的“作者”被视为阻止文本意义无限制膨胀的文化功能<sup>[4]</sup>。这些观念与阐释学的认识遥相呼应,汇入文学阐释的实践。

放弃作者意图的还原而转向文本,似乎标志着把文学阐释纳入现代阐释学。然而,摆脱作者的阐释学是否获得了更为“客观”的文本意义?这个追问涉及反复困扰哲学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当文本以固定的物质形式存在之际,文本的意义是否始终不变?如果杜绝读者的参与,文本的意义是否仍然如同一个地下矿藏“客观”地存在?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个文

本解读纷歧,这时,是否存在一个高悬之上的裁决标准?现代阐释学倾向于认为,没有解读就没有意义,尽管文本的符号始终如一。文本的意义无法脱离读者的合作,而且,每一次合作均可能形成不同的成果。哪怕是同一个读者阅读同一部文本,年轻时期的《红楼梦》解读可能与耄耋之年相距甚远。尽管如此,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扬此抑彼?耄耋之年的成熟、世事洞明并不能否认青春激情的意义。反之亦然。显而易见,每一次合作表明,由于读者自身以及周边某些条件的改变,读者与文本的相遇构成新的语义场,阐释迎来重振旗鼓的另一个机遇。当然,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后续问题:读者与文本的相遇是否存在某些限制——新的语义场可否无限延伸,从而为各种奇谈怪论提供空间?这些问题相当一部分涉及阐释学的重大争论:理解与解释、说明的对立。

自然科学的崛起对于知识领域进行重新划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具有不同的考察对象与研究方法。狄尔泰心目中,自然科学遵从的是解释或者说明,精神科学遵从的是理解。自然的各种奥秘客观存在,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阐释者所能做的仅仅是解释与说明,站在旁观的位置上客观地揭示与描述。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存在一个先于阐释主体的标准答案。科学家的工作是力图发现标准答案,而非自以为是地创造一套学说。相对地说,精神科学的理解内在地包含了主体的意志,包含人的本质投射,理解洞悉的各种意义亦即人的意义。但是,古往今来的理解必须依存于一个整体化的结构。由于这个结构的普遍意义,此时此地的理解才可能伸展到另一个时空维度。所以,理解既是主体的,甚至是主观的,同时又寄寓于整体的历史。

整体化结构的普遍意义再度点燃了统一知识的希望:能否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赋予理解、解释、说明一个共同的平台?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古老区分仅仅是一个表象,二者拥有相同的根系。自然科学的解释、说明仍然是一种理解——二者不可能截然

分开。主体的成分从未也不可能被真正而彻底地清除,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实验室仍然使用人工制造的仪器,各种理论的演绎仍然显示出人类共同遵循的逻辑。换言之,人们有理由将自然科学视为精神科学的组成部分。精神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共同平台即是阐释。一切从阐释开始。<sup>[5]</sup>哲学可以将上述思考引申到本体论范畴,譬如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学成为追问存在之意义的基础。存在仅仅而且只能是存在者的存在——当存在成为本体之后,理解即是打开存在的意义。存在者的理解始终处于存在结构之中,这决定了理解的前结构。理解不是一个孤立的认知开端,存在业已事先赋予深刻的烙印。存在形成理解,并且是理解之中的存在。

如果将海德格尔“理解的前结构”从哲学话语的玄奥表述转入具体的实践层面,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更为形象。存在形成的状况是,每一个体的“理解的前结构”凝结为既定的期待视域,暗中主宰阐释的对象选择以及意义的阐述;不同个体的期待视域交汇互动,并且积聚为一个更为开阔的历史视域。某种程度上,“视域融合”即是历史的内在衔接,每一个体共同卷入历史,并且充实了历史。当然,这种历史不再是客观的“自在之物”,而是诉诸理解的“效果历史”。<sup>[6]</sup>很大程度上,这即是阐释学层面的历史描述。

如同人文学科曾经产生的各种争辩,上述各种问题并未获得一锤定音的结论。不同的观点仍然层出不穷,许多命题的论证远未完善。然而,相对于古老的阐释传统,几个新的倾向愈来愈清晰:(1)文本作者的分量大幅削减;(2)文本意义的客观性遭受持续怀疑;(3)理解不再竭力剥离或者隐瞒阐释主体的存在;(4)理解的内容——从文本的意义到历史、存在乃至本体——不再是一个客观的固定对象。这些倾向制造的共同后果是,阐释学对于作者、文本、阐释者之间遗留的阐释裂缝愈来愈宽容。文本意义的解读超出作者意图,或者阐释者自出机杼、我行我素,均不足为奇。“积极

的阐释”拒绝将三者之间的裂缝视为阐释的缺陷,不再将作者意图作为修正各种观点的首要依据。相反,阐释者主动利用甚至制造这些裂缝,从中酝酿思想的突破。因此,阐释学显示出愈来愈强烈的标新立异的冲动,各种理论学派踊跃而至,一试身手,多元的阐释赢得了共存的空间,甚至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文学是“积极的阐释”最为活跃的一个区域。

### 三

相对于宗教、史学、哲学或者法学的阐释,文学阐释涉及更为复杂的层次。文学阐释的对象不仅是文本的语言构造,还包括作品的形象体系。前者是阐释的普遍问题,后者由文学阐释独享。

文学作品由形象体系构成,文学杰作的形象体系带来强烈的审美愉悦。这种现象由于神奇以至于成为待解之谜。为什么这些人物或者这种故事如此感人——为什么路人甲或者路人乙的事迹缺乏这种效果?形象体系的审美愉悦通常表现为感性领域的激动,亦即感官与情绪的激动体验。然而,文学阐释试图借助理性语言给予说明。无论是社会历史的考察还是精神分析学的溯源,众多重要的概念陆续将形象体系引入各种阐释脉络:历史、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性别对立、恋母情结、无意识,如此等等。文学阐释调集这些概念证明,社会历史或者精神成长积存的巨大能量凝聚在形象体系内部,赋予形象体系超常的魅力。

但是,理性语言——例如概念或者逻辑分析——与感性体验从来不是对称的。无论是海拔高度的数字还是岩石地貌分类、植被覆盖面积计算,没有哪一个学科的理性语言可能单独解释一座山峰带来的崇高之感。相对于感性体验的对象整体,理性语言既是深刻的,又是片面的。对于阐释来说,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裂缝恰恰是“积极的阐释”谋求的用武之地。理性可以提供多种形象体系的阐释视角:历史

的、道德的、美学的、民族心理的、阶级分析或者性别分析的、语言形式的,一种视角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另一种视角的关闭。相反,不同的视角可能相互声援、相互补充:某一个阶级成员可以在性别分析之中再度定位,阶级或者性别形成的社会地位可能曲折投射于叙事学,形成语言形式的某种特征。每一种视角的阐释追求逻辑的自洽,然而,阐释的结论并非像数学计算那般精确,以至于说一不二。事实上,众多文学阐释尾随一部文学作品的状况屡见不鲜,尤其是声名卓著的文学经典。文学经典的形象体系仿佛隐含不尽的意味,以至于可以承受各种理论的挖掘。鲁迅曾经不无调侃地指出人们对于《红楼梦》五花八门的阐释“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sup>[7]</sup>。当然,鲁迅远未穷尽《红楼梦》的“命意”,阶级斗争学说、“百科全书”的美誉、女权主义观点以及各种索隐考证仍然源源不断。人们几乎无法预料,哪里是《红楼梦》解读的终点。

文学阐释的活跃气氛显然有助于“积极的阐释”从事各种探索与尝试。譬如,弗洛伊德选择文学作为精神分析学的实践基地并非偶然。恋母情结、白日梦、无意识以及快乐原则、现实原则、压抑、焦虑、阉割这一套术语描述的内容令人瞠目,许多作家甚至愤怒地斥之为可笑的谎言,但是,精神分析学仍然势不可挡地演变为文学阐释的一个重镇。精神分析学各种别出心裁的解读表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距离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想,各种理论的逻辑架构都可以在这个空间找到容身之地。

或许还可以认为,一种新型的文本观念兴起开始潜在地为“积极的阐释”发放许可证。无论是中国古代批评家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身体时常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比拟文本结构。作为一种形式的边界约束,有机整体的文本结构保证形象体系的完整、协调,首尾一致,各个部分相互呼应。然而,新型的文本观念抛弃了有机整体的比拟——身体的生物性质与

文本的文化建构彼此相左。抛弃这种比拟与语言转向之后的文本认识息息相关。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认为,文本之中的主体已经丧失笛卡尔“我思”的完美统一,而是分裂为多重性的主体。在他看来,文本一直在工作,一直不停地生产意义,即使在文本完成之后。这时的文本不再是单质的统一,而是多种意义持续地混合涌现:

当人们视文本为一种多义的、多种潜在意义交叉的空间的时候,就已经有必要将意义从独白的、合法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并且将其多重化:内涵意义的概念或大量的第二意义、引申意义、联想意义那些连接在指示意义信息之上的语义“振动”就是向上述解放提供的帮助。<sup>[8]</sup>

因此,新型文本观念允许甚至提倡文学阐释攫取形象体系之中的若干片断,发掘、展示与提炼各种潜在的意义。一个文本不存在无可争议的主导意义;文本内部,多种意义既合作、呼应又冲突、矛盾。解构主义甚至认为,多种意义的交织深刻隐喻了形象体系的内在分裂。罗兰·巴特本人即是一个解构主义的杰出阐释者,他的《恋人絮语》与《S/Z》均可以视为激进的解构主义阐释实践。与解构主义不同,20 世纪下半叶逐渐崛起的“文化研究”倾向于关注严肃的社会历史主题,搜索隐藏于文本内部的阶级、种族、性别信息,辨认各种隐蔽的压迫与反抗。然而,“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时常秉持相似的文本观念——文本内部存在各种相互对立的意义。一个温情脉脉或者快意恩仇的故事背后可能潜伏各种负面信息,只不过这些信息利用形象体系制造的躯壳麻痹读者。灰姑娘终于等到白马王子后嫁入豪门,一个武功盖世的大侠最后一刻拯救了世界,这些情节设计始终葆有永恒的魅力,只不过支持这些想象的无意识充满了性别歧视与奴性的崇拜。“文化研究”必须撬开文本裂缝,将无意识之中的真相公诸于众。另一些“文化研究”的考察仅仅涉及作品内部的某种器物或者某种意象,譬如武侠小说之中的兵器

谱、古典诗词之中的植物、乡土文学之中的风景、都市文学之中的服饰描写,如此等等。这时,兵器、植物或者风景、服饰与形象体系整体只有微弱的联系,它们很大一部分意义脱离了形象构造,进入另一种意义网络之中获得阐释。更为具体地说,这时的阐释不再关注兵器、植物、风景、服饰如何作为形象体系的组成部分激起审美愉悦,而是在更为开阔的文化脉络之中审视它们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如何想象乃至“伪造”兵器谱?植物如何充当农业文明的美学标志?谁的风景或者谁的服饰——士大夫的还是劳苦大众的?如此等等。换言之,“文化研究”对于文本意义的阐释时常逾越形象体系的边界以及审美范畴。文本丧失了有机整体的性质,亦即丧失了整合文本意义的逻辑统驭功能。

的确,“积极的阐释”时常跨越审美愉悦的羁绊而另行制造各种新的话题。但是,逻辑的自洽无法消弭不绝于耳的质疑:可以甩开文学审美了吗?是不是又开始用意识形态分析充当审美的替代物了?事实上,那些审美指数底下的不入流作品同样可以提供兵器、植物、风景、服饰或者别的什么话题。脱离审美范畴,这些话题的阐释又能多大程度显示文学的真正内涵?种种诟病之辞表明,审美的持守是“消极的阐释”的重要内容。对于文学来说,理性语言的逻辑展开不能斩断感性体验的始源。“积极的阐释”可以认为,鲁迅的阿 Q 拥有贫雇农的阶级身份,居无定所、饱受赵太爷等土豪劣绅的欺凌和剥削,他对于假洋鬼子的鄙视以及动手瓜分赵太爷的财产体现了大无畏的革命倾向与造反精神。尽管如此,阿 Q 对于头上癞疮疤的忌讳、向吴妈求爱、与小 D 打架等等情节还是让人笑出声来。喜剧的反面角色似乎与阿 Q 的阶级身份不相吻合,可是,感性体验无法赋予他英雄的崇高感。

“积极的阐释”是否只能在感性体验核准之后生效?这个问题涉及“积极的阐释”与“消极的阐释”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可以认为,“积极的阐释”拥有审美范畴之外的广阔空间,

阐释的开拓充满各种可能。但是,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审美的意义始终没有消失。这是“消极的阐释”拒绝放弃审美的理由。对于人们的世界认识,二者的张力意味着什么?

#### 四

阐释的循环是阐释学的一个著名命题:整体的理解依赖部分理解的积累,部分的理解依赖整体理解的背景。逻辑的意义上,这种循环犹如缺乏递进的空转。哪怕尽量扩大循环的哲学半径,将所谓的“整体”从文本扩展为玄奥的“本体”,纯粹的循环只能回旋于一个静止的圆圈。“存在”的根本意义是真实的历史持续展开。历史内容持续增加,这些内容中断了循环的逻辑而使阐释形成历史性的相互积累:整体或者部分的每一次认识都带来新的历史认识。陶渊明、李白或者杜甫的文学阐释充实了文学史的“整体”,诗人与文学史之间的彼此印证构成了相互回声。然而,当苏东坡、曹雪芹或者鲁迅持续出现之后,他们所获得的文学阐释重新调整了文学史的“整体”,以至于陶渊明、李白或者杜甫的文学阐释将在另一个调整过的“整体”背景之下再度修订。这时,阐释的循环组成的复杂网络才能织入历史机制,完成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显然,文学阐释依赖的“整体”背景远远超出文学史范畴而扩展为众多文化经典——譬如哲学或者史学经典——构成的意义空间。解读中国古代诗歌的时候,不涉及儒家道德观念或者道家哲学,单纯的辞章分析只能收获若干语文知识。众多文化经典提供的概念命题、经验范式、价值准则不仅共同塑造社会成员的精神,而且或显或隐地指引后续文本的阐释。许多时候,博大精深意义空间以聚焦的方式投射到“部分”的阐释,形成分析赖以展开的理论压强。

在这种理论图景之中,“积极的阐释”显示出相反的理论回流路径。“积极的阐释”并非故作惊人语,哗众取宠,而是以犀利、独异的阐

释强力打入文化经典既定的意义空间,占据一席之地。这种阐释获得认可的最终标记是,扩充——哪怕是微小的扩充——意义空间的内容,甚至重组意义空间的秩序。“积极的阐释”扩充意义空间的特征不是增添阐释的对象,而是增添同一阐释对象的阐释观点。

或许必须承认,至少在目前,“积极的阐释”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文学阐释的范围内,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或者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均名噪一时。这种状况表明,读者掌握的权力愈来愈大。这种状况时常被视为文化民主的表征。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迟早会浮现出来:读者的权力会不会太大了?如果读者成为唯一的决定因素,如果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张力消失,文化独创的冲动会不会淹没于普遍的庸常之见?的确,文本的意义只能由读者实现。但是,当读者晋升为意义的最高标准时,作家不再拥有文化先锋的位置。“积极的阐释”要求向读者出让主角的资格,但众多读者的观念与认知参差不齐,泥沙俱下,这是“积极的阐释”不得不承担的风险。

公允地说,阐释学不可能驱逐作者,更不可能放弃文本。现代阐释的转向毋宁是请读者从模糊的背景之中现身,步入前台的聚光灯之下。文本的生产、解读以及意义的实现始终是作者、文本、读者三种因素的互动与博弈,缺一不可。传统观念之中,作者的地位远远优于读者——没有作者就没有文本,读者的缺席不影响文本的存在。然而,阐释学不再逗留于文本本身,而是关注文本投射出的意义影子。没有读者发出光芒,文本就不会产生影子。这个理论构图之中,读者掌控三种因素互动与博弈的主动。如果说,作者是文本生产的单一源头,那么,读者发出的光芒闪烁不定。作者只有一个,读者不计其数。不计其数的读者纷纷提出自己的阐释,构成文本意义的诸多变数。各个历史时段或者各个文化圈分别赋予读者各不相同的理解“前结构”,文本意义的解读无法拥有统一前提。两个稳定的因素乘以一个

始终不同的乘数,得数始终不同——这迫使阐释面对一个令人头痛的概念:相对主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阐释是否陷入了无从判断的泥潭?

自然科学的考察与研究方法作为范本之后,数学语言被视为标准答案的精确表述形式。从历史规律、个人心理动向到文类规则、审美判断,普遍公式的总结成为普遍的追求。这种背景之下,理性无法接受相对主义,甚至存在某种恐惧——同等有效的多元答案隐含对于理性原则的挑战。然而,读者理解的“前结构”表明,历史始终作为主体的组成部分内在地介入阐释。历史不是超然的“自在之物”,而是与存在交织在一起: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持续的互动不断解构形而上学的基础,取缔终极阐释的依据。人们必须承认,所有的阐释无不因为历史语境的转移而盖上相对的戳记,无论是善、恶、正义、公平还是美与丑。换言之,真正的问题是“相对”作为不可避免的前提之下,判断如何进行?

以赛亚·伯林曾经言及历史研究之中的相对主义:

在一个世代被认为或确信为相关的东西,在下一代是否会被认为是无关的?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是不争事实的,对另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可能也常常仅仅是一种理论(空谈)而已。的确如此。对证据的衡量规则在变。在一个时代被接受为历史资料的东西,在其遥远的后代那里却是如此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假设以致根本无法理解。我们将被告知,所有客观的东西都是主观的,是相对于它自己的时代与地点的;所有的精确性、可信性,一个智识昌盛时代的所有洞见与天赋,只有相对于他们自己的“舆论氛围”,才是如此;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一切皆流动不居。<sup>[9]164-165</sup>

伯林承认这种观点是一种“有益的提醒”,提醒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以及问题的复杂,尽管如此,“相对”的判断仍然成立。伯林认

为“客观”“真实”“公平”这些词仍然可以正常识别与使用,哪怕这些词的边缘常常显得模糊;不同的历史时段或者不同的文化圈仍然存在形成共识的基础,“其他文明的‘相对主义’与‘主观主义’并不能排除我们与他们共享某种基本的假定,这种共享使我们足以与他们进行沟通,足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被理解。这种共同的基础正是被正确地称作客观性的东西。它能使我们认同别人与别的文明,将他们视为本质上是人道与文明的。”<sup>[9]170</sup>

补充伯林的观点时,可以再度提到“历史语境”这个概念。如果说,历史语境的转移改变了阐释的有效程度,那么,这种状况同时表明,共同的历史语境内部包含一系列产生共识的条件,从共同认可的词汇、语法、逻辑到文类规范、修辞技术,从文化传统、道德风俗、社会制度到阶层身份、专业认同、人情世故,众多不言而喻的默契保证历史语境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共同的历史语境通常包含强大的沟通和交流愿望,无论是宗教意义的神谕、普通社会成员的信息交换,还是一部文学经典的高雅表述。作者之所以发表各种言论,阐释者之所以进行各种解读乃至激烈论辩,恰恰因为试图达成共识。人们没有兴趣与一棵树或者一堵墙壁喋喋不休地争执。如果缺乏达成共识的意愿,四分五裂、言人人殊的解读往往象征社会交流网络的崩溃。阐释是疏通与维护社会交流网络的必然产物,围绕共识的意愿展开工作;放弃共识意愿的阐释毋宁是某种智力游戏。共同的历史语境之所以为公认的阐释提供充足的条件,是因为公认的阐释往往与社会的公共守则或者共同行动密不可分。所以,多数时候,历史语境倾向保护阐释的公认程度,相对主义的理论袭击并非常态;人们没有必要担忧,刚刚发表的一个权威阐释是否将在半个小时之后失效。需要建立的一个观念是:任何阐释都无法自称永恒的真理,变化始终可能。但是,变化决非时刻发生,以至于所有的文化背景都如同纵横不定的紊流。人们始终栖身



于某种历史语境之中,这是变化的依据,也是稳定的依据。

当然,“积极的阐释”即是变化的标志,新锐的声音正在降临。事实证明,只有少量“积极的阐释”真正赢得广泛的认可。各个方面的质疑之下,多数尝试只能作为失败的思想实验沉没,继而“消极的阐释”吞噬。“消极的阐释”代表传统、权威、普遍成规与公认的观念,具有强大的阵容。尽管如此,“积极的阐释”不容忽视,许多划时代的理论飞跃始于思想实验。“积极的阐释”将摇撼众多传统的默契,形成剧烈的震荡与重组。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积极的阐释”可能暗示历史语境的巨大转移,甚至充当某种文化革命的先声。

#### 【参考文献】

- [1] 利科尔. 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 陶远华,袁耀东,冯俊,等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 [2] 刘勰. 文心雕龙注释[M]. 周振甫,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5.
- [3] 巴特. 罗兰·巴特随笔选[M]. 怀宇,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300-307.
- [4] 福科. 什么是作者? [M]//王岳川,尚水.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87-305.
- [5] 张江. 关于阐释论的提纲[J]. 社会科学战线,2023(11):147-151+282.
- [6] 加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84-385.
- [7] 鲁迅. 《绉洞花主》小引[M]//鲁迅全集:第八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9.
- [8] 巴特. 文本理论[J]. 张寅德,译. 上海文论,1987(5):91-96.
- [9] 伯林. 自由论[M]. 胡传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吴震华]

##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and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NAN F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Fujian 3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 of interpretation is the text. Textual interpretation is the basic method of the humanities, and a large part of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is conducted in this way.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and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are two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The frequent adoption of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is not only due to the turn of modern hermeneutics,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petus of theory. The reason why literature has become the most active area of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is largely because of the asymmetry between the rational language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ensual experience. Abandoning the concept of the organic whole of the text, "active interpretation" often transcends the constraints of aesthetic pleasure and creates various new topics. How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of relativism in interpretati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s both the basis for changes in interpretation and the basis for its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Most of the "positive interpretations" fade away as failed thought experiments, while a few "positive interpretations" may serve as the pioneers of some cultural revolution.

**Key words:**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the fore-structure of understanding; relativism; historical context